

误读、空白与隐讳：唐宋庐州 “修城”的回溯性考察及其历史书写

——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

张亮

提要：唐宋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时期，从唐朝的大一统到两宋的南北分据，庐州作为一个地方城市，城池修建异彩纷呈，其“大城”地位是以往未曾认识到的。城池修筑受到国家政策、区域地理格局和军事政策的多重影响，“修城”成为理解这一时期王朝军事战略的重要视角。结合近年来学界的研究成果，笔者对唐宋庐州城池的修筑做了梳理，对金斗城的修筑者、五代罗城的历史地位和南宋斗梁城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回溯性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对3座城池的书写及其筑城者评述存在一定的差异：金斗城托名修建、五代罗城淹没于地方史籍和斗梁城的隐讳描述，这反映了史家在著史中的曲笔现象。

关键词：庐州 金斗城 罗城 斗梁城

隋唐时期，庐州（今合肥）是江淮地区的政治中心。关于庐州城址的变迁，刘彩玉《历史上的合肥城》一文对合肥汉城、三国新城、隋唐金斗城、南宋斗梁城和明清合肥城池做了详细梳理。^①其中，金斗城至斗梁城跨越隋唐、五代、两宋，历经500年的变迁，以往研究中受史料限制，对这一时期城池修筑者、城址变迁及城池规模尚有不明晰的地方。近年来，史料发掘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城池的变迁提供了条件，本文旨在进一步细化唐宋庐州城池建设的历程。

一 托名的误读：隋唐金斗城的创设

唐朝是我国城市建设的鼎盛时期，不仅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城市防御体系，同时是城市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时期。庐州继两汉城池之后，唐时建立了砖砌城池。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对庐州城邑进行了考证：“府城相传后汉建安中刘馥所筑。唐贞元中刺史路应求以古城皆土筑，特加甃焉。”^②与两汉城市空间、形态、布局知之甚少相比，我们通过零星的史料大体可以勾勒出隋唐庐州城池建设的一般状况。

（一）隋唐金斗城的创设与得名

金斗城一般指隋唐庐州所筑之城，后来成为合肥的代称。嘉庆《合肥县志》指出，“今南半城名金斗城”^③。隋唐金斗城是在汉城残破的情况下修建的，汉代合肥县城位于南淝河北岸，地

* 本文为安徽省人文社科重大项目“宋代以来徽州礼学思想的演进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22AH040039）、合肥哲学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合肥城市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HFSKJC201802）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刘彩玉：《历史上的合肥城》，《江淮学刊》1963年第2期。

②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26《南直八》，中华书局，2005年，第1272页。

③ 左辅纂修，合肥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嘉庆《合肥县志》卷5《营建志》，黄山书社，2006年标点本，第83页。

势较低，容易被水侵袭。“梁天监五年韦睿攻合肥，堰肥水灌城”，就是利用了合肥地势低洼的地理特点。^①从南朝梁开始至唐初时期，合肥的军事地位仍然较高，城墙应该仍然是存在的，韦睿攻下合肥后，“于是自历阳迁豫州，治合肥”，后合肥又为南豫州、合州等州治所在地。理论上合肥不可能是无城可守的空城，“然其城新旧无考”，在历史文献中很难搜索到这一时期合肥城池建设的相关记载。^②

合肥城池再次载入史籍是隋唐的金斗城。合肥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万历《合肥县志》并未提及金斗城，其《城郭图说》提到汉城、唐代砖城，“世代兵燹，城邑废兴，合肥在三国时曹魏据悍东吴，乃旧城，惟只土筑，而至唐路应求始甃之”^③。万历《合肥县志》中还推测合肥三国新城废置的时间为隋大业三年（607），合肥开始州、县同城，“唐制，合肥县在庐州西北三十里，即新城可知，而州自为城，不以县附。隋大业三年，改合州为庐州，始移县于州，而新城遂废”^④。当然，这一推测仍有探讨的空间，我们从三国新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整个三国新城遗址经过发掘的地方，除现代耕土层和近代扰土层外，就是三国时期的文化层堆积和遗迹，叠压关系非常清楚”^⑤。简言之，从文物发掘的角度基本可以推定合肥县城是三国西晋之际迁回合肥旧城的，三国合肥新城只是一座军事城堡，仅存于战争环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隋唐金斗城的创设是另筑新城，完成了城址的变迁，但建城时间较难考证，宋代地理文献《太平寰宇记》《輿地纪胜》大多指向隋朝初年。

关于金斗城的得名，一种说法来自于星斗，“天文一星在南斗曰合肥，对九江星，夹辅黄道而合肥入斗度最多，故号金斗”^⑥。《太平寰宇记》在“金牛城”词条中认为“牛”库本同，万本作“斗”^⑦。刊刻中牛斗误用亦有可能，“牛”“斗”指二十八宿中的“牛宿”和“斗宿”。金斗城的另一得名来源于“巢湖出黄金”之说，《輿地纪胜》载：“金斗城，在合肥县西。隋开皇五年置。或云：汉永平十一年，巢湖出黄金，太守献之。或取此义。”^⑧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唐杜刺史作斗门，引肥水入金沙滩，故名”^⑨。宋以后，流经合肥城池的南淝河有金斗河之称，城因“河”得名或河因“城”得名，未知孰是。但两宋以后，金斗城成为合肥的代称，特别是南半城多称金斗城是明确的，清朝康熙年间的庐州知府王阶曾有《金斗城》诗作，指的也是庐州城。

金斗城的创设除了时间上的不确定外，筑城者同样存疑。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唐朝初年由尉迟敬德完成的，“公元618年隋末农民大起义后，唐开国元勋武侯大将军尉迟敬德（即尉迟恭）来此，认为汉城地势低洼，另选东南处的高地建起‘金斗城’”^⑩。由于南淝河北岸低洼不宜营建城池，“必须重新选择新的城址，其先决条件是：地势高，水运便利。前者可以防止河水漫城，

① 参见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26《南直八》，第1271页。

② 参见胡时化、魏豫之等纂修：万历《合肥县志·创设志》，万历元年（1573）刻本，第63页。

③ 胡时化、魏豫之等纂修：万历《合肥县志·城郭图说》，万历元年刻本，第13页。

④ 胡时化、魏豫之等纂修：万历《合肥县志·创设志》，万历元年刻本，第63页。

⑤ 李德文：《合肥市三国新城遗址的勘探和发掘》，《考古》2008年第12期。

⑥ 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编：《史记两汉书三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2册，第155页。

⑦ 参见乐史著，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26《淮南道四》，中华书局，2007年标点本，第2503页。

⑧ 王象之著，赵一生点校：《輿地纪胜》卷45《庐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57页。

⑨ 左辅纂修，合肥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嘉庆《合肥县志》卷4《山水志》，第68页。

⑩ 翁飞：《大合肥的历史文化底蕴》，罗平编：《不得不读的合肥故事》，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页。

后者可以解决航运交通和城内军民的饮水问题”^①。根据这两个条件，唐贞观年间，相传大将军尉迟敬德在合肥汉城东南高地筑土城，合肥城址的位置由南淝河北岸迁往南岸。不过，在唐、宋、元的史料中并没有提及尉迟敬德监造合肥城的事迹。这一观点主要是近代以来人们依据文献记载所做的推测，嘉庆《合肥县志》引旧志记载，明弘治七年（1494），合肥修街市时曾挖出筑城石碑一块，碑文如下：“弘治七年，郡守宋公鉴令人平金斗冈作街市，以居贫民。当冈峡处，有古沟高三尺，阔二尺五寸，砖甃甚固，沟口有石一方，刻云：‘尉迟敬德监造’。”^②据此推断金斗城造于贞观年间且为尉迟敬德监造。

（二）托名尉迟敬德修城的误读

唐代合肥城是否由尉迟敬德监造是值得商榷的，从两点可以佐证。

一是尉迟敬德的经历与合肥似无太多交集。通过《旧唐书》《新唐书》中《尉迟敬德传》分析，尉迟敬德为朔州善阳人（今山西省朔州市），隋大业十三年（617），跟随刘武周起兵反隋，担任偏将，攻陷晋州，拔介休，克太原；武德三年（620），兵败归顺唐朝，这一时期活动范围主要在山西。后参与李唐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闥、徐圆朗的统一战争，颇有功勋；唐武德九年，参与玄武门之变，拜右武侯大将军、吴国公，随后朝廷任命他为泾州道行军大总管攻打突厥，这一时期活动范围主要在西安等地。贞观三年（629），尉迟敬德离京任襄州都督；贞观六年，迁任同州刺史；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分封功臣时给予世袭刺史，诏令授予尉迟敬德宣州刺史，改封为鄂国公；贞观十三年，尉迟敬德调任鄜州（治洛交，今陕西富县）都督；此后，尉迟敬德又出任夏州都督；贞观十七年，致仕还家，不问政务。通过上述尉迟敬德仕途经历的梳理，可知他与合肥并无明显交集。在明清《庐州府志》《合肥县志》的《职官表》中也未发现尉迟敬德的记载。

二是“尉迟敬德监造”的铭文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现和记载。道光《云南通志稿》引明旧志载：“三塔在府城北崇圣寺中。高四百余尺，凡十六级。旁二座差小。相传唐尉迟敬德监造，开元初重修。”后经考证可能为工匠尉迟恭韬之误，“塔顶有款识，为唐开元元年南诏请唐匠恭韬徽义造”^③。相关记载还有北京晋阳庵一处记载，“唐大士像，古铜身三尺，下刻大唐贞观十四年尉迟敬德监造字”^④。在安徽省九华山化城寺藏经楼下有一尊“释迦牟尼铜像”，原置三天门聚龙寺，铜像铸有“尉迟敬德监造”字样，相传尉迟敬德曾至九华山建佛寺，但经鉴定此佛像造于宋代。^⑤

有研究者注意到，尉迟敬德作为唐初名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元明之际日渐神化，他与另一唐初名将秦叔宝变成了“门神”，“左边门神秦叔宝，右边门神尉迟恭”，受到民间百姓供奉。“各地不少寺、塔、城池都号称唐尉迟恭（敬德）所建，甚至砖石上铭有‘尉迟敬德监造’字样。”^⑥这种现象遍布全国，在京津、河南、山东、安徽、云南等地方志或地方史料均有记载，许多佛寺都云由尉迟敬德建造或监修，仅在华北明确记载由尉迟敬德建造或监修的佛寺就达30

① 刘彩玉：《历史上的合肥城》，《江淮学刊》1963年第2期。

② 左辅纂修，合肥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嘉庆《合肥县志》卷36《志余》，第669页。

③ 阮元、王崧、李诚纂修，年四国等点校：道光《云南通志稿》卷210，云南美术出版社，2020年标点本，第8册，第408页。

④ 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3页。

⑤ 参见《九华山志》编纂委员会编：《九华山志》，黄山书社，1990年，第177页。

⑥ 钱进：《千年之谜：衢州建城史与尉迟恭传说（上）》，《衢州日报》2017年11月27日，第4版。

所。^①除了监造寺、塔，相关传说中还有尉迟恭监造城池的记载，如衢州、淮安、池州、合肥、泰州等，“尉迟敬德监造”成为值得注意的一个文化现象。

为什么尉迟敬德监造城池的说法散落各地，这与中国军事文化传统有密切关联。一方面尉迟敬德骁勇善战，攻城掠地，颇有成就，城池托名尉迟敬德监造，一定程度上是将其作为城池的保护神，反映一城人民祈冀城池永固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是尉迟敬德晚年迷恋仙术，喜好筑池建台，“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②。

“至于‘尉迟（恭）敬德监（敕）造’城墙砖，相当于尉迟恭这位大神的法印、符篆而已。从方志记载来看，无论是寺、塔还是城池，尉迟监造砖的出土数量很少，说明尉迟砖起的是一种镇压驱邪作用的‘吉语’砖。”^③因此，虽然合肥发现过有“尉迟敬德监造”城墙砖的存在，既不能把它作为合肥唐代建城的物证，也不能说明唐庐州城为尉迟敬德造，“尉迟敬德监造”大多为后世伪托。

二 历史的空白：淹没于史志的张崇修罗城

由于受战乱等因素影响，唐朝末年至五代时期形成一次修筑城池的高潮，包括城池修筑、加固和增修罗城等。据有关学者统计，唐末五代时期南北方均有城池修筑，以南方为主，以州城为主，其中杨吴、南唐政权更为热衷，合肥正处于这一区域。从所筑城池的形态而言，“经过本时段创筑而具备子—罗双重城市结构的州城主要分布在南方”^④。由于合肥地理位置重要，合肥早年就存在城郭，“懿彼肥川，旧有罗郭”，唐末五代更加强化了城池的建设。

（一）后唐张崇修庐州罗城

唐人曾言：“自咸通十年卢谏议出牧此州，值彭门用军，邻封多警，累拜表章之请，遂兴版筑之功。”^⑤唐咸通十年为869年，这段话表明在合肥旧有城郭破坏的情况下再次奏请维修，这也符合唐末五代时期对重要州郡进行维修的历史背景。唐天祐四年（907）张崇到任庐州，从869年至907年，又经历了数十年，“绵岁月以滋深，致缔建之匪固。渐成崩溃，难御奔冲”^⑥。因此，张崇修建城池的决心很大，在得到朝廷允许后便开始大兴土木，动用民力，利用农闲，“况今稼穡丰登，烟尘贴息。宜当农隙，潜募子来”^⑦。天祐十二年四月，合肥罗城修建完工，历时8年。

唐末五代这次城池修筑涉及内城、郭城的公共设施。在内城中，对街市、衙舍、学校、道路、桥梁等建筑设施进行了修葺，“凡诸廨宇，久历星霜，多至摧颓，咸新剝削……公皆表里修换，躬亲指南……所建州内廨舍，间架甚繁，兼添置梵舍琳宫，神祠儒庙，及造明教桥一所，次造市桥一所，次造县桥一所，次造通远桥一所，次造西水阊门一所，奇妙难名”^⑧。在外城，“郭内官路，造小史桥一所，次造赤栏桥一所，东正门桥一所，崇化门桥一所，怀德门桥一所，

① 参见冯金忠：《从赳赳武夫到修寺善士：华北民间尉迟敬德形象之嬗变》，《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1期。

② 《旧唐书》卷68《尉迟敬德》，中华书局，1999年标点本，第1686页。

③ 钱进：《千年之谜：衢州建城史与尉迟恭传说（上）》，《衢州日报》2017年11月27日，第4版。

④ 刘闯：《唐末五代增废州县与修筑城池之地理分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09页。

⑤ 殷文圭：《后唐张崇修庐州外罗城记》，《全唐文》卷868，中华书局，1983年，第9093—9096页。

⑥ 殷文圭：《后唐张崇修庐州外罗城记》，《全唐文》卷868，第9093—9096页。

⑦ 殷文圭：《后唐张崇修庐州外罗城记》，《全唐文》卷868，第9093—9096页。

⑧ 殷文圭：《后唐张崇修庐州外罗城记》，《全唐文》卷868，第9093—9096页。

都共造桥一十一所”。^①

从城池的规模看，唐末五代时期张崇所筑庐州城已经达到合肥城池史的一个新高度。修砌后的城池规模在江淮流域亦算是大城，“其城周回二十六里一百七十步，壕面阔七十丈至六十丈，深八丈，城身用瓦砌高三丈，置窑灶五十五所。其砖每口长一尺三寸、阔六寸”^②。张崇修罗城并不是对过去城郭的简单修复而是扩建罗城、新建部分城防设施。唐末五代州城规模一般为城周10里，而庐州外城达到26里之多，庐州城规模已然是一般州城的两倍，足见其在区域城市中已属大城。

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载：“合肥旧称险固，古语谓‘天生重庆，铁打庐州’，言其难犯也。”^③五代时期的合肥亦是如此，在庐州外城没有完全建成的情况下，后梁两次对合肥用兵，均无功而返，分别为天祐六年（909）、天祐十年。后梁两次对合肥用兵进一步坚定了张崇筑城的决心，“此际坚墉渐备，浚洫已周。巨堞屹而山横，大弩发而雷吼”；“非肥水之深壕高垒，不足以外挫贼锋”^④。张崇筑合肥罗城，不仅扩大了合肥的城市空间，加强了城防和公共设施的建设，而且彰显了合肥成为江淮流域的“大城”，对后世合肥城市空间影响深远，“基本可以肯定，庐州里坊之区划、设置应当就是在张崇修筑庐州罗城之时”^⑤。

（二）张崇筑罗城的历史书写

中国古代的城池建设历史悠久，形成了外郭内城的多重城墙结构，但这多限于都城和诸侯城。地方城市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功能单一，城墙内多官署衙门聚集之地。从南北朝开始，在地方城市中出现“子城”设置。子城是指大城所属的小城，包括内城、附郭的瓮城或月城都属于子城的范畴，而大城一般是指罗城（外郭城），它通常作为普通百姓和市场之所。出现罗城的地方城市多为军事和政治功能突出的区域中心城市。

我们现在能获悉张崇所筑罗城的情况主要来源于《后唐张崇修庐州外罗城记》一文。张崇为了树碑立传和彰显功绩，天祐十四年（917）聘翰林学士殷文圭撰写此文，详细记载庐州扩建罗城的建设过程，对城池雄壮大为赞赏，“立中流千年柱石，壮吴部一面山河”，“三重之雉堞延登，四望之秋毫必见”^⑥。合肥罗城具有多重城防设施，进一步巩固了合肥的防御能力，“建造罗城门十三所，及大弩楼都共四十四所”。由于此文是受邀所写，殷文圭对张崇大加赞誉，“公旦暮检籍，躬亲指挥”，“良可匹矣”，故文中对张崇的溢美之词便不难理解。

《诸山圣迹志》对张崇筑罗城也有所记载。《诸山圣迹志》是五代后梁到后唐时期敦煌名僧范海印巡礼中原佛教圣迹的游记，记录沿途一些城镇的状况。^⑦《诸山圣迹志》所载庐州城的情况大约为天祐十六年（919）的情况，当时庐州城已经建成，由于张崇信奉佛教的原因，范海印对张崇评价亦较高：“州主张相公笃（信）僧口，弥崇福佑”，“任庐州二十三年”“此人（地）往来高林，无不赞赏，至今见在矣”。不仅描述了庐州佛教的兴盛，也指出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商旅往来频繁。^⑧范海印还对城池规模作了描述，城周围三十里，当为约数。这一记载与殷文圭

① 殷文圭：《后唐张崇修庐州外罗城记》，《全唐文》卷868，第9093—9096页。

② 殷文圭：《后唐张崇修庐州外罗城记》，《全唐文》卷868，第9093—9096页。

③ 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26《南直八》，第1272页。

④ 殷文圭：《后唐张崇修庐州外罗城记》，《全唐文》卷868，第9093—9096页。

⑤ 鲁西奇：《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1页。

⑥ 殷文圭：《后唐张崇修庐州外罗城记》，《全唐文》卷868，第9093—9096页。

⑦ 参见郑炳林、陈双印：《敦煌写本〈诸山圣迹志〉作者探微》，《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

⑧ 参见郑炳林校注：《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70—271页。

所记庐州罗城“周回二十六里一百七十步”相差3里多，殷文圭所记应该更为可信。“至于范海印所记庐州城周，很可能是大概的估计所得，亦或是听当地人口头传言，因此有一定的误差。”^①《诸山圣迹志》也从史料层面进一步证明庐州城池规模之宏大。

这样一座大城、坚城，在合肥城池发展史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但我们在合肥地方史志中却难寻其踪迹。纵览现存不同时期合肥地方志《城署志》《营建志》均无张崇筑罗城的记载，而两宋时期的地理著作如《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亦无相关记载，嘉庆《合肥县志》虽引用《十国春秋》张崇的相关记载，但并未提及合肥筑城的情况。张崇所筑罗城规模之大、修建时间之久，理论上不应该被历史地理史家所忽视。

究其原因，这与历史上对张崇的评价不高有关。张崇任职庐州期间，横征暴敛，大兴土木，不惜民力，百姓怨恨。《十国春秋》《资治通鉴》多称其暴戾恣睢，甚至新创“渠伊钱”“捋须钱”等名目公然勒索，张崇成为贪腐的代名词。“崇在庐州，贪暴不法”^②；“州人苦之”，“为庐州患者二十余年”^③。这或许是史书中（特别是地方志）对张崇修建合肥罗城记载颇少的原因，使五代庐州城几乎淹没于史籍之中，这与史家选择性的历史书写有着一定的关系。

三 书写的隐讳：南宋时期斗梁城的变迁

从城防建设修筑的结构和内容来看，南宋是城墙建设进一步完备的时期。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城防设施需要更加坚固。在《宋会要辑稿·方輿》中有两章专门记载“修城”的篇目，可见在北宋城池“不修”的大背景下，南宋开始注重加强城防设施。尽管南宋初年仍然存在“不修城”与“修城”、“修城”与“练兵”孰重的争议，但到南宋时江淮流域成为抗金前沿后，南宋明显加强了对江淮流域城池的建设，这一区域又进入一个城池修筑的高峰期。除了唐朝五代已采用的砖砌城墙的做法，还增建了更多的城墙附属设施，如为弥补城门防御的弱点，增建吊桥、瓮城、月城、敌楼、女墙等，还将北方盛行的羊马墙引入到南方。

（一）合肥城市防御地位的确立

旧志载：“宋初（指北宋，作者注）改军为庐州，合肥附之，属淮南西路。南渡后，置淮西安抚史，治于合肥，实为边境。”^④庐州城在整个南宋军事防御体系中具备独特的军事价值与经济价值，具有“边城”的特征。从军事角度看，关于两淮、长江和江南三者之间的关系，宋人王霆分别用藩篱、门户和堂奥来形容，所谓“两淮藩篱也，大江门户也，三辅堂奥也。藩篱不固则门户且危，门户既危则堂奥岂能久安乎？”^⑤这句话意指两淮为屏障，长江为门户，两淮不守，屏障不牢，门户难守，指出了两淮对巩固京畿的作用。这一观点，实际上又回到三国时守江与守淮关系的命题上，“守江莫如守淮”成为南宋多数君臣的共识，而合肥正是淮上重镇。同时，从经济上讲，两淮区域经过唐、北宋的发展已经超越北方，成为区域经济的中心之一，区域内的扬州、庐州、寿州、无为等均为域内重镇，“两淮膏腴千里，表护江、浙而不可失者也。金陵重地得人守之，则穷年皓首而不可拔”^⑥。江淮流域已然成为拱卫京师的咽喉之地，故有人指

① 陈双印、张郁萍：《庐州张崇事迹考——兼谈S.529v〈诸山圣迹志〉写作的绝对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3期。

② 《资治通鉴》卷271《后梁纪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80页。

③ 《资治通鉴》卷271《后梁纪六》，第3156页。

④ 胡时化、魏豫之等纂修：万历《合肥县志·邑纪》，万历元年刻本，第20页。

⑤ 《宋史》卷408《王霆传》，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2315页。

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标点本，第1320页。

出：“今江淮形势，表里连亘数千里之间，为襟喉抗制之地者，不过承楚、襄汉、合肥耳。”^①

不过，在守江、守淮的取舍之间经历了一个过程，守江弃淮、江淮并重和重淮弱江三个阶段。^②抗金名臣李纲曾详细梳理全国各郡的布防要点，在两淮区域中，“淮西路寿春为帅府，庐、舒、蕲为要郡，光、黄、濠、和为次要郡。淮东路扬州为帅府，宿、亳、楚、泗为要郡，真、海、通、泰为次要郡”^③，这份布防的重点在于沿淮州郡城郭的控扼。辛弃疾在防御布局上同李纲有相似的看法，指出虽然南宋都城临安，有“阻江为险”，“然江之为险，须借两淮”，“城楚城扬于东，城庐城和于西，金汤屹然，所以为守者具矣”^④，也强调了守淮和防御的重要性。

整个南宋江淮流域布防体系也是围绕楚、扬、庐、和等几个重要城池展开，这几处城池成为“控扼边防，为国屏翰”的军事要塞。^⑤到宋孝宗时期，两淮地区已经建立起完备的城防体系，筑城成为普遍现象。程大昌曾指出：“淮上筑城太多，缓急何人可守。设险莫如练卒，练卒莫如择将。”^⑥从宋高宗时的筑城兴起到宋孝宗“淮上筑城太多”仅仅数十年间，可见淮河沿线成为南宋“边城”后修城力度之大。宋孝宗是南宋时期对抗金较为积极的一个皇帝，重视防御，其在位期间加大城郭建设的力度，多次修葺庐州城防设施。

《宋会要辑稿》对庐州城的修建有详细记载，修建时间集中在宋孝宗、宋光宗、宋宁宗时期。从乾道六年（1170）至嘉定四年（1211）40余年的时间内，庐州城至少修葺了6次，在整个江淮流域城池建设中亦属罕见。这一时期庐州城的城池结构、形态发生明显变化，增修月城、瓮城，城址也发生变化，是五代张崇修城以来又一次深刻变化。

南宋合肥城池修筑历程表

时间	修建者	内容	备注
建炎元年（1127）	胡舜陟	时淮西盗贼充斥，舜陟至，修治城池、楼橹、战棚，又增筑东西水门，固濠垒以备冲击，庐人始安 ^⑦	淮西盗贼充斥
乾道五年（1169）	郭振	筑斗梁城，横截旧城之半，跨金斗河北而阻绝旧城于斗梁之外 ^⑧	诏修庐州城 ^⑨
乾道六年	郭振	庐州城围并已修筑整备，合用防城篋篙脾抱座挂塔器具，用钱浩瀚，伏望支降度牒百道，相兼计置 ^⑩	自是相继修葺

① 《全宋文》卷4133《张浚十三》，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8册，第79—80页。

② 参见周燕来：《南宋两淮地区军事防御体系研究——以宋金和战时期为中心》，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9页。

③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356页。

④ 辛弃疾：《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王步高、刘林辑校：《辛弃疾全集》，珠海出版社，2002年，第264页。

⑤ 参见周燕来：《把浅：南宋两淮军事防御体系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⑥ 《宋史》卷433《程大昌传》，第12859页。

⑦ 《续资治通鉴》卷99，岳麓书社，2008年标点本，第597页。

⑧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26《南直八》，第1272页。

⑨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第9450页。

⑩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第9451页。

(续表)

时间	修建者	内容	备注
乾道九年(1173)	郭刚	庐州城壁每年差拨一军五千人,欲望睿旨于诸军共差一千人前往,专一修治未备城池。每及一年,依此差人交替 ^①	城池修建常态化
淳熙十五年(1188)至绍熙五年(1194)	宇文绍节	增东西二栅,议修筑古城,创造砦栅,专为固圉计 ^②	
庆元元年(1195)	王知新	因命整治,并疏暗渠,浚长壕,修瓮城,视旧加倍。壁垒崇坚,楼櫓相望,称雄淮右。复请于朝,岁遣金陵戍卒三千,以时缮治,号防城军 ^③	暑雨暴涨,冲突城壁
开禧二年(1206)	田琳	增修	
嘉定四年	李大东	于是新城、古城悉加修筑,数月而就,并疏三壕,合鸡鸣山水入于市河,金汤益固,比险方汉云。古城凡九十三处,羊马墙八百八十四丈,水坝九处九十二丈,卧牛一十五处五百二十六丈。又增修古城一带女头,与内城相为雄长云 ^④	夏潦浸淫,城壁多圯

(二) 南宋的斗梁城及历史叙述的差异

南宋斗梁城的修建在宋孝宗乾道年间,相较于汉城、隋唐合肥城,斗梁城在空间上有所突破。它的修建起于军事目的,但却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斗梁城的城市空间范围一直延续至新中国,可以说南宋确立的城市空间范围延续了近800年,奠定了合肥城市发展的基础。

时合肥为淮南西路的驻地,“而江淮城郭间有颓圯”,郭振到任后发现合肥旧城残破、狭小。^⑤宋孝宗下诏修合肥故城,在《宋史》《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乾道五年,“诏趣修庐、和二州城”^⑥,“诏修庐州城。明年三月二十二日兴工,四月毕,修筑军士第赏有差”^⑦。这段史料说明乾道五年下诏修庐州城,乾道六年(1170)三月动工,四月完成,用时月余,但鉴于斗梁城为别筑新城,应是“相继修葺”^⑧,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其“四月毕”应该是城

①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第9451页。

② 《宋史》卷398《宇文绍节传》,第12116页。

③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第9451页。

④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第9451页。

⑤ 《全宋文》卷6786《程秘十二》,第19页。

⑥ 《宋史》卷34《孝宗二》,第645页。

⑦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第9450页。

⑧ 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26《南直八》,第1272页。

防设施的修整。

郭振为何会跨金斗河建城？据旧志载：“先是，城皆据金斗河为濠。宋乾道间，郭振帅淮西，以镇大城小，遂展拓之，跨于河而立水关二。”^①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似乎跨河而建是由郭振有意为之，且为一次性规划，但实际上斗梁城的修建不是一次性规划完成的。由于有水系之利，自唐至南宋，唐庐州城之北、金斗河两岸自发形成商业和手工业作坊集中的区域，故有“镇大城小”之说，此处的“镇”为商业街区，而“城”则为城池。如何建城，郭振首先是南截旧城，约三分之二，后向北拓城，拓城之初是将城墙移到金斗河南岸，以金斗河为城壕，将金斗河北岸隔绝于城池之外。这样做是迫于战争压力，由于旧城为唐末五代之际张崇所筑，子城、罗城一体，“广十九里有奇”，短期内修复整个城池较为困难，故“亟欲就功，缩旧址三之二”，突出了城市的军事功能。

但另一方面，金斗河北岸当时已然形成商业街区，居民众多，这样所筑之城是将镇北居民隔于城外，缺少城池保护，引起金斗河北岸百姓的不满。为平息民怨，“郭遂于斗门外筑缠堡以护之，其状如月，故亦谓之月城”。城池开始跨越金斗河，故有“斗梁城”之称。河流入城后，河流入城口成为城池防御的薄弱环节，为加强防御，在河流入城口和出城口各立水关。由此可见，斗梁城的形成不是有意规划而为。

对此，《絜斋集》中所载《秘阁修撰赵君墓志铭》中对南宋合肥城的形成有较为明晰的记载，时人对当时的历史记载应该是较为可信的。文字摘录如下：

东西有两栅，肥水贯焉。开禧用兵，敌攻东栅，军民悉力捍御。敌退之后，帅臣田琳，匝环瓮之，西栅未及也。公帅将佐登陴览观，具见其疏漏，敌所必攻，爰请于朝。建三洪巨门以杀水势，楼橹壮伟，横跨门上，视东栅有加焉。复建议包筑故城，为久远规。故城者，唐张崇所筑，广十九里有奇，然兴兵祸夷为丘墟。乾道中，郭亲军振请城之，亟欲就功，缩旧址三之二，创筑新城十五里，俗呼为月城。此城既筑，而合肥县及市北居民皆隔于外，耆老有弃而不顾之怨。郭遂于斗门外筑缠堡以护之，其状如月故，亦谓之月城。此亦足以稍慰人心矣。而故城未复，缓急终不可恃，合力增筑，既高厚而加瓮焉，此则公之志也。^②

在《宋会要辑稿》中也有对郭振修城舍弃北半城的批评：“郭振修筑以古城中分为二，于市河之南别筑斗梁城，横截旧城之半，而阻绝市河于斗梁之外。旧北城约七里，不复加葺。曾不知郡当西淮要冲，市河通彻巢湖，可以漕运，又有居巢、历阳、射胡关相为犄角。乞行筑修，且乞开浚城外长河三道，以增城壕之深，以壮形势。”^③阻河于城外可能正是由于军事的需要，“旧北城七里”与“广十九里”“缩旧址三之二”两者面积相当，可见郭振修城之初是没有将金斗河北纳入城池范围的。从城池规模上看，宋代的斗梁城达到了中等州县的规模，与其行政地位大体相当。

地方史志对斗梁城修葺的表述使用了隐讳的手法，对修筑之初“横截旧城之半”“舍弃北半

① 潘镗：《闭水西关记》，贾晖修，王方岐纂：康熙《合肥县志》卷18《艺文》，康熙三十六年（1697）刻本，第269页。

② 袁燮著，李翔点校：《秘阁修撰赵君墓志铭》，《絜斋集》卷17，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标点本，第276页。

③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第9451页。

城”少有叙述。万历《合肥县志》追溯合肥城池修葺历程时提及郭振，“郭少保始拓之”，意在赞誉。而明朝人潘鏜、杨循吉均以“镇大城小”“遂展拓之”，强调郭振主动跨金斗河修建城。在嘉庆《合肥县志》援引《輿地纪胜》，载为：“宋孝宗乾道五年，淮西帅郭振又拓其北，名斗梁城”，但细观之，这样的表述与《輿地纪胜》中“斗梁城”词条有关表述是存在差异的，原载为：“乾道五年，郭振筑新城，号斗梁。横截旧城之半，而阻绝旧城于斗梁城之外。”^①这种书写方式实际上“曲笔”的表现，与“直书”相对，它反映了著史者委婉表达的一种笔法。当然，曲笔虽是对历史事实有所取舍或曲意修饰，是主观行为，但也有客观因素，如史料占有不足等因素。

结 语

庐州作为一个地方城市，城池建设中“修城”与“不修城”主要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同时城池规模也反映城市在地方行政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军事地位对城池的影响。在《历史上的合肥城》一文研究的基础上，全文进一步细化了唐宋庐州城的发展历程，对唐宋城池修建提出3点补充。一是金斗城是否建于唐朝是存疑的，也不能因为发现尉迟敬德城砖就认定为尉迟敬德所修，我们在合肥历史中尚未发现尉迟敬德与合肥有过交集；二是从金斗城到宋斗梁城经历了300余年，唐末五代时期合肥也是割据政权争夺的焦点，合肥城池在唐末五代初经历了精心的修葺，城址规模很大，这在历史中有明确记载，后唐张崇所筑的合肥子城和罗城结构大大拓展了合肥城池的规模，已经明显超越金斗城的范围；三是斗梁城为南宋郭振所拓，过去我们习惯于认为他将金斗河纳入城中是有意为之，但我们通过《絜斋集》中所载《秘阁修撰赵君墓志铭》和《宋会要辑稿》的发现，斗梁城的形成并不是有意规划而为，而是逐步完成的。

唐宋庐州城池的建设，涉及3个主要人物：托名修城的尉迟敬德、大规模修建庐州城池的张崇和将庐州城北半城舍弃不用的郭振，历史书写中对3人的描述却大相径庭。尉迟敬德作为唐初的战将，虽与合肥无交集，但地方志书在描写时为了突出本地历史文化，对名人加以发扬，却未必符合史实，有托名之嫌；张崇所筑罗城规模宏大、修建数十年却不为正史或地方史迹所记载，究其原因是由于张崇劳民而未被史家所认可，对于“修城”的政绩避而不谈；郭振在人们的视野中多视为循吏，筑斗梁城时虽舍弃北半城未考虑百姓利益，但史家为了维护郭振的形象，亦将这一历史舍去，显示出传统史书和地方志在书写中的曲笔与隐讳。

（作者单位：安徽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

^① 王象之著，赵一生点校：《輿地纪胜》卷45《景物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标点本，第1360页。